

戰爭、同化與階級

——〈志願兵〉與公民身分的追尋

莫素微

中華技術學院共同科專任講師

中文摘要

〈志願兵〉是作家周金波第一篇以戰爭為背景的小說，這篇作品並成為他思考「皇民化」問題的起點。但戰後，〈志願兵〉卻為周金波在台灣文學的地位，換取了「皇民作家」等充滿爭議性的名聲。

過去的多數評論認為〈志願兵〉所欲傳達的是一種對殖民母國日本的終極認同，以致自陷殖民者刻意創造的殖民思維或殖民心態，屬於殖民政策的產物。然而，這種解釋忽略了文學作品作為公共領域、提供內在辯論的功能。

本文試圖藉由對文本與殖民台灣之社會結構的再閱讀，證明周金波其實是利用〈志願兵〉，提供了一個以論辯消滅異質認同的公共領域。小說中的主角，代表了不同階級的台灣人，使用過去不曾存在於台灣島上的共同語言，藉著這個公共領域，進行消除異質化認同的論辯。客觀的第一人稱，除了作為一個冷靜自省的凝視結構，也是容納一切可能目標、算計的平台。〈志願兵〉這個論壇，並不是終極的目標或信念，而是被周金波策略性地用來反映殖民體制下人性共同的真實，因為它仍然允許對帝國作為與價值的懷疑，與個人利益的算計等供台灣人自省的課題。

關鍵詞：周金波、志願兵、公民身分、同化、皇民文學、血液

War, Assimilation and Class :

Shiganhei and the Pursuit of Citizenship

Mo Su-Wei

Lecturer,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Shiganhei (「The volunteer」, 1941) is Shu Kin-Pa's first novel based on the scene of war. And it also becam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Shu to contemplate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zation. Since then, his relatively short literature career is inevitably entangled with the subject. *Shiganhei* without precedent narrated itself through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which on the other hand unfortunately coronated Shu as an archetypical Kominbungaku writer.

Most criticisms perceived *Shiganhei* is intending to express a unquestionable identification towards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y without due reflection, so could only be characterized as a sheer product of colonial policy. Such interpretation, however, neglects the public sphere created by the novel with intention as a forum of dialect over the major themes such as citizenship, assimilation and ethnicity.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evidence that the author used *Shiganhei* to provide an arena for the diminution of identification crisis of the islanders. A dialect is therefore created by the author which allows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representing diversified classes to talk to each other utilizing their common tone. And the narrator is designed as a gazing infrastructure to accommodate all possible alternatives. The forum created through *Shiganhei* is not the final prospect per se, but the reflection of differentiated ends pursued by the colonial humanity. Since *Shiganhei* actively allows certain curiosity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s over the imperial value.

KEY WORDS : Shu Kin-Pa, *Shiganhei*, citizenship, assimilation, Kominbungaku, blood

戰爭、同化與階級

——〈志願兵〉與公民身分的追尋

午前中送台灣軍夫出征，台灣人此時完全分擔了兵役啦，總是這歷史的變動期，台灣人也參加歷史行動是極其當然的。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

公民除了搖旗吶喊外，還必須為國而戰，而且有參與總動員的義務。

——Michael Mann

一、前言

戰爭或軍事行動，是一種與人類歷史長期共存的社會機制。雖然戰爭行為所帶來的傷亡、破壞與饑饉、疾病，是此一社會機制長久以來為文學、哲學、政治社會科學學者所批判、詬病的主因。不過，戰爭在事實上的持續發生，說明了一切準備戰爭的社會行為，都可能在特定時空條件下被合理化、正當化。相對的，特定時空條件也決定了戰爭本身以及參與戰爭之人員的社會評價。因此，將描繪戰爭事物的文學，分類為所謂的皇民文學與反戰（反侵略）文學，其實是反映出了創作者與評論者對於這些時空條件的刻意選擇與詮釋趣向¹。所以，欲理解並公正評價描繪戰爭事物的文學與其創作者，除了探究戰爭發生的原因與其社會意義外，也必須透視、分析與還原這些時空條件。

¹ 同意見參閱：西川長夫，〈戰爭と文学—文学者たちの十二月八日をめぐって〉，《立命館文学》第573號。（2002年2月），頁515（「說文學或文學者對於戰爭是協力或抵抗，並不正確。應是說文學或文學者對行使戰爭的國家或國民是否協力或抵抗吧」引用段落筆者譯）。

〈志願兵〉是作家周金波第一篇以戰爭為背景的小說創作。自此，作家短暫的創作生涯與戰爭主題幾乎無法分開。〈志願兵〉除了在形式上首度嘗試以第一人稱的主觀敘述（「我」），凝視兩名主角之間冗長的對話來呈現外，也因作品結尾數行裡「出色的結語」²，為周金波在戰後台灣文學的地位，換取了諸如「不折不扣的皇民文學」³等充滿爭議性的名聲。同時也因此阻礙了多數評論者對其文本深入閱讀的興趣⁴。

本文以下嘗試由〈志願兵〉中豐富的對話與論辯，剖析作家藉由這個以共同語言築構的公共論壇，所欲呈現的本島人在歷經沉悶的殖民壓抑後，面對因戰爭而出現的爭取與內地人相同待遇的機會時，兩種、甚或是多種可能的選擇。並說明作品中兩個對話的主體，不但是對應戰爭的兩種期待——對外的國族認同整合，與對內的階級平等，其實也正是作家對於不斷出現在其後作品（如〈鄉愁〉）中，兩個矛盾的自我——一個結結實實的，「已經是日本人」的帝國菁英與代言人，和象徵著殖民地野蠻、原始力量的未開化暴力——的最初凝視。

二、小說梗概

（一）人物

在東京執筆的處女作〈水癌〉發表相隔半年後，周金波的第二篇小說〈志願兵〉，發表於《文藝台灣》（《文藝台灣》第2卷第6號，1941年9月20日）。

² 參閱：辻義男，〈周金波論——聯の作品を中心に〉，《台灣公論》7月號（1943年），頁80。漢譯參閱：柳書琴譯，〈周金波論——以系列作品為中心〉，《文學台灣》第8期（1993年10月），頁242。

³ 參閱：葉石濤，〈文藝台灣及其周圍〉，收錄於氏著，《文學回憶錄》（台北：遠流出版，1983年），頁16。

⁴ 因賣力批評作者的所謂「把自己奴隸化」、剝奪台灣人的「漢族主題性」而誤讀者如陳映真（參閱：陳映真，〈精神的荒廢〉，《聯合報》，1998年4月3日）。對於周金波文學作品因「皇民作家」之冠冕而在戰後被「靜靜地埋沒」的描述甚多，主要可參考：中島利郎，〈「皇民作家」的形成——周金波〉，收錄於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317。垂水千惠，〈戰前「日本語」作家——王昶雄與陳火泉、周金波之比較〉，收錄於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台北：前衛出版，1994年），頁98，以及F. Y. Kleeman, *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p.202-4。

與前一篇小說〈水癌〉最大的差異是，〈志願兵〉擁有較完整的小說結構與人物形象。小說的篇幅也大大增加了。由此可以看出周金波企圖正式揮軍進入文藝創作生涯的意志。〈志願兵〉以第一人稱（「我」）展開敘述，主要登場人物如下：

- 1、「我」：「我」是張明貴的姐夫（「義兄」），曾是留日學生，八年前回到故鄉基隆就業，然滿腔熱情已被生活磨光。
- 2、高進六：血書志願的台灣青年，張明貴的小學同學，為達成日本人的目標而前進，認為成為日本人是使台灣更上一層樓的方法，最後血書志願達成皇民目標。
- 3、張明貴：暑假返鄉探望台灣的留日青年。和高進六同樣為成為日本人而努力，但兩人因方法論不同而發生爭執。最後當進六血書志願一事上報後，不得不服進六愛台灣的心，因而與「我」共勉要更努力推動台灣成長。

（二）梗概

小說場景從迎接回鄉人潮的基隆港開始，描繪港口的擁擠、人物的生活狀況等，讓人感受得到當時台灣的氛圍。

滿載歸鄉遊子的「高砂丸」緩緩駛入基隆港，「我」沉思於感慨中。憶起自己八年前搭乘「吉野丸」級的船回鄉之景，當時帶著別離東京生活與自由的「離愁」，回到傳統紅磚砌成的家中，在台灣落地生根。職業與家庭的壓力，粉碎了最初回國時的滿腔年輕夢想與熱情。今日來到當初回鄉的港口，迎接與自己相同航路回鄉的妻弟張明貴，而有短暫時間回溯東京的記憶感到美好。

正當「我」沉思於其中時，明貴的小學同學高進六也來到港口迎接明貴，使「我」得以認識高進六。「我」發現高進六不僅日語流利，又是同街出名的孝子，行為操守端正而檢點，不禁對他產生好感。

「我」與進六在岸邊靜候，談起明貴的來信情形，正談起明貴在這剩下一年就要畢業的暑假突然回國一事，明貴突然出現在二人身邊，明貴說因家中逼婚，以致少寫家書，索性連照片都不寄了，卻因每周一日到圖書館看台灣報紙

的機會，見到台灣的改變，因而想回來看看，然而，因期望過高，第一眼便覺有些失落。進六告訴他有些改變是他所未見的，兩人因而討論起來。

進六離去後，明貴與「我」談起進六之事。明貴說進六日語流利，是因在小學畢業後就到日本人經營的食品店工作，並因此改名「高峰進六」，進而問起「我」改姓名一事。「我」向他解釋，因為上有高堂較難說服，而無法順利改姓名，但明貴卻沒有「我」原先想像的冷淡批判「我」，「我」也感受到明貴的寂寞感。

當晚，「我」去拜訪明貴，催促出門走走，明貴卻表不願意，因為，明貴正在等進六來，並在給「我」一個土產（銀座買的高級香煙盒）時抱怨回國未買禮物而被家中責罵一事。「我」是過來人，因此了解他的無奈。「我」並提到堅固的思想老殼是不易打破的，自己因此而變得不感症。談話間進六來到，談到自己因參加報國青年隊，想測試自我的忍耐度而戒了煙，進六並邀請明貴隔天一同去體驗拍掌修練儀式，但明貴卻明白表示懷疑與不感興趣。

四天後，「我」到明貴家拜訪，但卻看到兩人激烈論辯如何成為日本人的方法，「我」試圖從中調解，無功而返。隔晚，明貴因迴避進六而逃到「我」的店中，深表對於進六毫不懷疑的形式主義表示不能苟同，且不願和解。

十天後，當「我」看到早報中標題「血書志願，高進六君」時，匆忙要去找明貴，在未到他家前追上剛從進六家回來的明貴，明貴表示對進六真心服輸，認為他才是真心為台灣好的人材，並且向進六低了頭，鼓勵自我要更努力，最後，以「我」隨著明貴步上感覺漫長的樓梯為結尾。

三、平等地位的渴望：公民的、認同的與經濟的

歷史學者 M. Mann 在分析兩次大戰與階級的關係時曾指出，在一八五〇年後，資本形成了國族疆界，其後隨著國際競爭，資本愈益國家化，也使得特定階級的地緣政治意識愈明顯。市民國家裡與資本活動息息相關的中產階級，一方面對外要求建立一個集中而有力、可以掠奪地緣優勢的國家，一方面則是對

內爭取公民權利，在法律、宗教或教育上取得優勢地位⁵。前者是一種個人對於外在壓迫感的反應，是對世的需求。後者則是代表參與公民權利所能取得的物質與光榮、自尊。這兩種成分，適足以解釋公民對於戰爭的態度：公民之所以支持、參與戰爭，是期待能對外實現愛國主義、國族認同，並能對內確認自己的階級地位與資源利益。

在中日戰爭以後，日本政府所開始積極推行的皇民化政策中所謂的「皇民」⁶，是「皇國臣民」一詞的簡稱⁷。「皇民」的意義是由上對下的，由皇國要求做為臣民之人滅私奉公，犧牲貢獻⁸，因此寓有濃厚的命令與政策色彩。至於在市民國家中所謂的公民地位或身分，則有所不同。它意味著能夠在同一主權領域內享有社會福祉與政治參與平等權利的一群人。這群人也透過政治參與而取得經濟資源上的共享與自理。在戰前日本明治憲法下的公民，其權利內涵也是如此。這些「律令制國家之民」，享有參與地方自治（選舉權）、擔任地方公職之權，以及其他法律上的保護。

不過，被殖民者與他們的土地，通常不被視為殖民母國的一部分，而是必須被隔離的、臣服的領土。這是因為在血統以及文明的進程等時空條件上，殖民地與母國仍有相當的差異（「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很渺小的人種，……文化水準還很低的人種」〈志願兵〉）。即使不談血統的問題，由於殖民地在社會條件與文化進程上與母國畢竟有所差異，因此仍有待母國加以「文明化」、「現代化」——包括透過教育、公共衛生等設備，漸漸複製與母國共同的記憶，使之能實現「國民統合」。所以，二次大戰前包括英國、法國與日本在內的殖民帝國，雖然同意賦予殖民地人民以殖民母國的國籍，但是都沒有將他們視為真正的帝國公民⁹。

⁵ 參閱：M. Mann, "War and Social Theory", in *State,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8), pp.154-6。

⁶ 關於「皇民化政策」、「皇民化教育」推行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基礎，參閱：長浜功，《国民学校の研究：皇民化教育の実証的解明》（東京：明石書店，1985年），頁41。

⁷ 參閱：坂本多加雄，〈国民・皇民・公民〉，佐佐木毅、金泰昌編，《国家と人間と公共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頁1。

⁸ 此由皇民奉公會在1941年4月18日成立時採取的實踐要綱四原則（「貫徹皇國精神」、「竭盡職分奉公的赤誠」、「確立後方生活體制」、「協力推進非常時經濟」），可以得見。參閱：〈待望皇民奉公會成立〉，《台灣日日新報》，1941年4月19日。

⁹ 參閱：J. Costa-Lascroix, "L'acquisition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une condition d'intégration"

既然權利僅歸屬具公民身分之人，尚未成為公民的殖民地人民，在教育、就業、政治參與，甚至是單純的經濟生活與物質上，必然會有所差別。而這種差別，固然可能在主觀上會製造出某種「殖民心態」¹⁰——包括如下所說的，殖民地菁英對於母國標準的嚮往與差別的不耐、焦慮——但是其原因卻是客觀的。

由於這種差別待遇，凝聚了殖民地人民取得與殖民母國國民相同政治與經濟權利的渴望，希望取得公民地位¹¹。這種企求，並非僅是如部分論者所說的，只是追求表面的、「喧鬧的東京街頭所代表的那套現代性」¹²，而是在精神與物質、對世與對人上面，整體的提升，取得與內地人相同的完整人格。此由〈志願兵〉的文本，即可得見（「不，我不是指什麼建築物、廣場啦這些東西，我說的是，像苦力啦、小孩啦，我看沒什麼改變，剛才，不是有穿白衣的軍人嗎？他的面前，工人和小孩毫不在乎的穿過去，不是嗎？我所要說的不是那些具體的東西」）。

特別是對於殖民地的菁英來說，他們在內地接受教育，親身體驗過「像日本人的生活」（〈水癌〉）後，往往因為這種不知如何突破、何時才能結束的被差別，而陷入「漫長孤獨的殼」¹³。既與「舊態依然」「好像看不出有什麼進步的地方」（〈志願兵〉）的台灣，「一直有段距離」，卻又苦無方法確認自己成為日本人的資格。在欠缺共同平台——包括語言、共同利益與命運的情形下，台灣「文明化」的進展緩慢。雖然知識階級們自許為「做同胞的心病的醫生」（〈水癌〉），試圖努力藉由來自殖民母國的教育，以及知識權威，實現理想中的文明狀態，不過，終究難敵真實世界的力量：「所寫、所講的，真的沒有人共鳴」，令他們

in S. Laacher, *Question de Nationalité* (Paris: CIEMI/L'Harmattan, 1987), p.129, 以及 E. I. Chen, "The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Empire: Legal Perspective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R.H.Myers, ed.)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43。

¹⁰ 參閱：呂正惠，〈皇民化與現代化的糾葛——王昶雄〈奔流〉的另一種讀法〉，「台灣文學研討會」（台北：1996年）。

¹¹ 當然，在殖民地陣營裡，也不乏有反同化的聲音。如蔡培火即認為，應以自然發展與非強制性手段達成與內地普遍性的同化。其結論認為理想的方法應該是賦予本島人相當程度的自治，以自行發展出與內地平行共生的文化。參閱：蔡培火，〈吾人の同化觀〉，《台灣青年》第1卷第2期（1920年），頁67。

¹² 參閱：L. T. S.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28。漢譯本則參閱：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51-52。

¹³ 參閱：周金波，〈私の歩んだ道—文学、演劇、映画〉，收錄於中島利郎、黃英哲編，《周金波日本語作品集》（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頁254。

對台灣所處的情況是既疏離，又焦慮。這也正是在發布志願兵制度前，周金波自己坦承的心情寫照。

在包括日本在內的市民國家裡，公民身分並不是可以當然取得的。作為一個公民，必須理解並認同市民社會所欲追求的共同價值。另外，要享受權利，也必須有負擔義務——包括遵守法律、納稅、服兵役等等之能力¹⁴。

以共同價值來說，它是由多數族群或「先來者」強勢的言說所設計的。想要成為公民的人，必須被這種共同價值「同化」，或甚至是被「現代化」、「文明化」。其標準由先來者認定。然而，日治時期台灣的「同化」，不論是在初期的分離與漸進主義，或是中後期的同化主義，對受到現代化教育，已經準備回台灣大展身手的殖民地「領導階級」來說¹⁵，都太緩慢了。

領台初期，日本政府即不認為在台灣未被現代化之前，能夠放任台灣人自治取得公民身分。這個觀點，一直延伸、實踐到一九一九年就任之第一位台灣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之施政方針內容中¹⁶：

不能把台灣和英法諸國之殖民地視為同一；統治的方針為使島民成為純然的帝國臣民，教化善導之，馴其向我朝廷忠誠，涵養對國家之義務觀念。惟在實施上應慎重查核，監督其緩急先後，不可驟然對在地理、民情、語言及風俗相異之台灣民眾實施與內地相同之法律與制度。……應先普及教育……使其（與內地）醇化融合……最終達成政治均等之境界。

即使其後經過了四十年的統治，作為日本公民所應享有的憲法權利，台灣人始終沒有辦法取得：殖民母國仍然「反對憲法在台灣施行。……須等待教育普及，台灣內地人口增加，土人信賴日本視為祖國後，才能詔敕發布日本國憲法的適用」¹⁷。對台灣文化發展程度的保留固有之，基於本島與內地在生產鏈的附從關係與維繫內地階級權力關係所刻意的壓制，更是主因。

¹⁴ 參閱：T. Marshall & T. Bottomore,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8。

¹⁵ 關於周金波筆下「領導階級」的論述，參閱：莫素微，〈現代化與公民化——由周金波〈水癌〉中的醫療主題出發〉，《台灣文學學報》第6期（2005年2月），頁77。

¹⁶ 參閱：《田健治郎傳》（東京：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1932年），頁384-385。引文筆者譯。

¹⁷ 參閱：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年9月5日），頁72。引文筆者譯。

至於負擔義務的能力方面，作為一個公民，除了受國家的保護外，必須有能力參與、貢獻社會。因此，公民必須具備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包括智力、身心健康狀態、教育程度以及專門職業技術訓練，都是有能力參與、貢獻社會的條件證明，也是作為公民應具備之基本品德。

這些能力充分反映了支持市民國家日常運作的隱性社會價值。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意欲取得公民身分之人，這些能力提示了選擇「同意接受」而非單純「享受」公民權利時，所應該具備的資格與付出的代價。簡單的說，就是一種公民對於國家表達效忠的日常形式。

為國家服勞役、兵役，大概是符合公民身分條件最具體的證明。不過，並不是任何國民都可以充當兵員的。具有軍人精神與軍紀涵養，是根本的要件：「欠缺對國家社會之共同目的的理解，或是欠缺在共同生活中發揮完全個性之努力者」，是無法擔負軍職的¹⁸。因此，對於殖民地人民施行兵役問題，雖然自明治二十二年開始就已經展開激烈的討論¹⁹，但是一直到昭和十七年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施行之前，基於對台灣人在軍隊操作中最根本需求的日本語能力之懷疑²⁰，不論是志願役或是徵兵，本島人都無緣參與。

所以，可以想像，當台灣志願兵制度宣布後²¹，「情況為之一變，大家的表情變得生氣勃勃，話也多起來，完全露出真實的性情。我們坦然相對地『緊密』

¹⁸ 參閱：佐藤鋼次郎，《軍隊社会問題》（東京：成武堂，1922年）。

¹⁹ 參閱：加藤陽子，《徵兵制と近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年），頁141。

²⁰ 同上註，頁254。對於台灣人無服兵役義務之原因，加藤邦彥有不同的解釋。他認為是因為日本政府對於與支那人同屬漢系民族的台灣人之效忠程度，始終抱著不信任的態度之故（參閱：加藤邦彥，《一視同仁の果て—台湾元軍属の境遇》（東京：勁草書坊，1979年），頁56。以及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年），頁220）。不過這個說法很難解釋為何在昭和17年前關於台灣與朝鮮之徵兵制度，早已經著手討論（包括養成語言與國民精神之訓練所，也早在籌建中），且反抗更為嚴重的朝鮮人，反而較早實施徵兵制度。事實上，日本政府對於造成普遍性國民負擔的徵兵制度之實施，一直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參閱：加藤陽子，同上註，頁55以下）。因此，正確的解釋應是，在無法確定此一高成本行為之效率（包括在語言教育不普及狀態下，軍令貫徹之可能性）前，不願將之施行於台灣。

²¹ 日本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適用於台灣，是在1941年5、6月間，由陸軍三長官（大臣東條、參謀總長杉山以及教育總監山田）同意政策方向，並於6月5日在陸軍省課長會議中正式報告。會中決定自昭和17年度起採用千名陸軍志願兵，並視實績檢討於十年後在台灣正式施行徵兵制度。6月20日由陸軍大臣秋田向內閣提出「施行台灣志願兵制度文件」，同日內閣決議通過，正式實施。至於過去因對與素質參差的台灣、朝鮮兵員共乘一

在一起了，同樣是來自於精神發揚的強烈要求，使這『緊密』結合成了可能」²²。因為，「志願兵制度有台灣人的願望寄託」。而這個「台灣人的願望」，就是藉著參與殖民母國的戰爭活動，取得公民身分，掙脫被差別的地位，或是更進一步，能整合台灣人過去不知所以然的國族認同。對於周金波來說，藉由志願兵等奉公的作為，所緊密結合的「我們」，不但是指本島人與內地人，像作者般孤獨的菁英，也終於能和台灣坦然相結合，認同，不再疏離。從帝國的觀點看來，志願兵制度固然是將台灣人「皇民化」，但是對台灣人來說，卻是藉此取得了平等地位的「公民化」。

當然，不可否認，除了殖民地菁英對於志願兵制度所編織的同化想像外，還有一個在〈志願兵〉小說中所承認的重要事實，那就是有相當比例的志願兵投入者，是處於台灣社會階級裡的底層者（如高進六者），或是雖欠缺經驗，但擁有膂力與信仰的年輕族群（如〈無題〉中的敏司）。他們試圖藉由參與奉公，謀求與其他台灣人，甚至是日本人，在經濟與社會地位上的平等：「上戰場替軍隊勞動之人，家宅都可以掛上鑲有日本丸的『榮譽之家』木牌，在升學上也可以與日本人子弟一樣，受到特別眷顧」，「文官帽戴不成，戴飛行帽也一樣可以在都市街道上昂首闊步」²³，「日本人的配給量比台灣人多，而改成日本姓氏的台灣人，也比一般台灣人得到更多的配給」²⁴，「街坊的氛圍氣為之一變。過去常常鄙視我們為笨蛋客家婆的御用紳士，以及因為我們麵店無照營業而拒絕配給的飲食店組合長，多次拘留我母親的經濟警察，學校的師長，市役所的公務員，態度一夜之間全都改變了。鄰居也都來我家拜訪，登門對雙親問候致意。我們也得到了食料品與日常用品的特配券」²⁵。

船感到不安，以及兵員需求較少，以致並不考慮接受殖民地志願兵的日本海軍，基於 1942 年後兵員因海戰損失嚴重，也在 1943 年通過閣議，於台灣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同年 10 月採用一千名訓練生。關於台灣志願兵制度之討論資料甚多，本處主要參考者為：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5 年），頁 47-51。

²² 周金波，〈私の歩んだ道—文学、演劇、映画〉，同前註 13。

²³ 參閱：黃華昌，《台灣・少年航空兵—大空と白色テロの青春記》（東京：社会評論社，2005 年），頁 31。引文筆者譯。

²⁴ 參閱：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高雄：第一出版社，2002 年），頁 15。

²⁵ 參閱：黃華昌，同上註 23，頁 37。

同樣與志願兵題材相關，周金波口中「在台灣最尊敬的作家」張文環在一九四二年的作品〈頓悟〉，以及呂赫若在一九四四年的作品〈清秋〉中，也都強調了志願兵與徵召制度這種對島民現實生活——包括就業、轉業的契機、甚至是在差別地位下閹割焦慮——的改善功能。〈頓悟〉裡連中學都無法升進、雖是窮人家出身卻又抱持貴族心態的「我」，迫於學識與家境，不得不委身無法認同與投入的店員工作，以致身心虛弱，甚至無能向暗戀對象表白。最後，因為志願兵制度的發布，頓悟到「要突破這個社會的密林，只有當兵而已」，志願當兵不但能獲得「精神生活的飛躍」，還能鍛鍊身體，重建男人的價值。而在〈清秋〉中，志願兵與徵召制度不但提供了飲食店經營困難者轉業的機會，也讓原本因不願剝奪房客生存權與展開市場競爭的留日醫學生耀勳，意外地獲得開業的動機，解決了「滿足一家的繁榮與讓父親安心」的現實考量。

不過，就志願兵制度的現實功能，雖然觸角伸往同一方向，〈志願兵〉與前述二作品最大不同之處，是在於更深入卻隱諱地呈現了這個選擇在階級結構上所造成的隱憂²⁶，以及對本島既有社會權力狀態的挑戰（如下述）。

四、共同語言平台下的論辯與算計

認識了上述同化過程中的政經背景與階級矛盾後，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志願兵〉必須以持續的對話與論辯形式來展開。然而此一對話與論辯，並不僅在內容上具有實質的意義。論壇的形式本身，特別是所使用的共同語言，就已經呈現出一個對抗異質化認同的工具。這是周金波對於皇民時期文學功能的認識：「大東亞文化共榮圈的確立，民族問題不解決，是無法考慮的，同樣的台灣文學的意義，也是不提這個問題就無法探討的」²⁷。

對周金波來說，因為有了志願兵制度，正好提供「在台灣的三個民族」藉著「達成聖戰而協力向前邁進」的理由，展開彼此認同對話的契機。不過，為

²⁶ 參閱：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Verso, 1991), pp.110-1 (根據 Anderson 的說法，只有不受海外殖民晉升階級所威脅的統治階級，才會對殖民地的獨立深感哀悼，至於那些庶民階級，則是慶幸去除了競爭者)。

²⁷ 周金波，〈皇民文學の樹立〉，收錄於中島利郎、黃英哲編，《周金波日本語作品集》（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頁211。

該制度所鋪路的共同語言——日語，更是促使三個民族中的日台人、福佬人、客家人與原住民，以及不同階級，能夠參與這個公共論壇的前提。

由〈志願兵〉中一再被提起的語言能力，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思考的軌跡。在「我」與高進六初識的對話中，就已經呈現了共同語言的奇妙功能。「我」與高進六雖是第一次見面，但是察覺有「一種奧妙的融合氣氛」，以致對他甚有好感，甚至以為他是明貴中學的同學：

「不，我和明貴是小學時代的同學，我只是小學高等科畢業而已」

「哦！是這樣嗎？因為你的日本話很流暢，所以我一直都以為這樣的」

「我」承認高進六「熟練的日本語操作」，形成了某種魅力感，超越了學歷與階級的限制，使得不相熟的「我」也不禁要向張明貴稱讚兩句：

「日語很棒呢！我還一直以為是日本人，……」

至於張明貴與我，既然都是在東京就讀或完成大學學業，日語能力自然是不用說了。尤其是張明貴，說得更是明白：

……我在日本的領土出生，我受日本的教育長大，我日本話以外不會說，我假使不使用日本的假名文字我就無法寫信，……

日語因此成為了〈志願兵〉中殖民地知識階級與勞動者、各民族展開論辯與對話的橋樑。也是殖民地人民最初的共同認同。有趣的是，日語這個公共設施，卻是由殖民者所提供的。日本領台之初，台灣島內有語系複雜；有福佬語、客家語、以及各種原住民語。各個族群間並無共同語言，當然也就沒有展開公共論辯的機會。受制於漸進的同化政策，最初日語教育並不普及，不過，自中日戰爭後開始廣設講習所，全島的日語理解率有顯著的增進。到了一九四三年，幾乎已經達到了 70%²⁸。「這種（對國語能力）反省才是使現代的本島青年發憤、

²⁸ 這是依據藤井省三的推斷。參閱：藤井省三，〈ある日本語作家の死—周金波追悼〉，《台湾文学この百年》（東京：東方書店，1998年），頁162。可以設想其推斷可能是根據《台灣統治概要》（台北：台灣總督府，1945年）中所載，台灣兒童在當時之平均就學率已

激勵的原動力。昔日本島青年對這最重要的國語問題等閒視之，對此，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可是真心誠意的。不像過去本島青年認為因是本島人國語不好也不可恥。這種想法實在應該予以唾棄」²⁹。

不過，在〈志願兵〉中，日語也僅是作為各個階級台灣人彼此之間溝通認同的工具，並非如陳火泉〈道〉中所暗示的，是台灣人理解純正的日本精神的基礎，得以藉此決定台灣人能否取得公民身分。〈志願兵〉是台灣人間對話的舞台。因此，台灣人的日語並不需要好到「醇正無雜質」，也毋須獲得日本人的認同，作為一視同仁的資格。當然，更不能成為恆久差別台灣人的理由³⁰。

藤井省三在〈日語作家之死——追悼周金波〉一文中，曾意有所指地表示，這種在世界史上罕見的透過語言的同化而被日本化的例子，「有助於共同意識的形成，使得台灣等身大的民族意識萌芽」³¹。而這個由國家機器創造認同論辯契機的弔詭，也正好呼應了自〈水癌〉以來，周金波所試圖聯繫其創作的三部曲——「現代化—公民化—國族化」³²：只有靠著國家的力量，包括傳遞現代化知識的語言能力之構建，才能溝通領導階級與其他台灣人，以帶領實現現代化。在〈志願兵〉中各階級所欲論辯的認同意識與方法，正是接續著基礎結構現代化後，台灣人欲朝向公民化之路途邁進的先決要件。

經高達 71.3% 而來。其餘具體數據如依據昭和 12 年的國語普及率指導方針，三年內應達平均 80% 的普及率（參閱白井朝吉、江間常吉，《皇民化運動》（東台灣新報台北支局，1939 年，頁 249））。不過，這當然是無可能實現的官方計畫；在實際面，依據鷺巢敦哉的論述（參閱：鷺巢敦哉，〈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台北：台灣總督府內台灣警察協會，1941 年），頁 229-230），即使到了 1941 年，義務教育普及率應該還是低於百分之五十。

²⁹ 〈徵兵制をめぐつて〉，收錄於中島利郎、黃英哲編，《周金波日本語作品集》，頁 288-289。

³⁰ 對於〈道〉中「國語」觀的批評，參閱：陳培豐，〈走向一視同仁的日本民族之「道」——「同化」政策脈絡中皇民文學的界線〉，「臺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 年 11 月 22 日。

³¹ 參閱：藤井省三，〈ある日本語作家の死—周金波追悼〉，《台灣文學の百年》，頁 162。比較其他殖民帝國的語言同化政策，戰爭時期日本在台灣語言同化教育的成就，確實是罕見的。參閱：陳培豐，〈重新解析殖民地臺灣的國語「同化」教育政策——以日本的近代思想史為座標〉，《台灣史研究》第 7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頁 8。

³² 參閱：莫素微，〈現代化與公民化——由周金波〈水癌〉中的醫療主題出發〉，頁 84。

五、血統的政治學

在對話與論辯的實質面，周金波也大膽地鼓吹台灣文學界應該藉由志願兵制度這個平台，處理過去無法觸及的根本社會意識與矛盾。除了民族（自然也涵蓋了血統、共同價值與文化程度）問題外，並暗示了階級衝突的可能。

前面已提到，還未被同化的殖民地「異民族」，必然要受到差別。而血統正是判別「異民族」最簡單的手段。對於長期處於閉鎖狀態的單一國家來說，血統規範是相當客觀的。祖先遺傳下來的血統，透過生父或生母、出生證明或戶籍、部落所在地調查報告書³³，都可以證明。不過，對於自十九世紀開始努力擴張國族版圖的國家如日本來說，由於不可避免的殖民與混血，不論在現實上或政策上，血統的範圍都無法客觀。因此，必須藉由敘述與制度，來想像它的疆界。

換言之，血統中除了科學的人種因子外，其實還包含有源自共同祖先的隱喻；共同祖先提供了凝聚國族的共同性與歸屬感，同時也構建了共同生活、分享共同文化的親密想像³⁴。血統傳承，是人類內心深處追求、保存進化與繁衍之基因的必然反映。不過，對於這種基因的信仰，卻多半倚賴國族知識分子創造的史詩或神話。例如共同祖先對抗惡劣的生存條件、艱苦的遷徙、抵抗（或侵略）並殲滅敵人、犯錯衰敗甚至流亡但又再次復興等具有高度戲劇性的故事等等。其目的不外乎在於證明基因的繼續存在價值。接續了血液，自然也就承襲了這飽涵國族智慧與強韌的「優秀血液」中的基因，以及它的遺緒（血統利益）。

所以，血統的定義符號並不是實體、客觀的，而是擁有國族表徵之解釋權的多數族群或「先到者」的主觀決定³⁵。描寫血統的基礎，可能是因應周遭之自然條件所衍生的生存方法或慣習，也可能是現有體制所賴已建立並維持的政治哲學。對身處「外地」的台灣人能否取得與日本人相同的血統利益，解釋權自然同樣的保留在母國的殖民權力手中。

³³ 例如所謂的「天正檢地帳」。參閱：本田豊，《江戸の非人：部落史研究の課題》（東京：三一書房，1992年），頁201以下，以及朝尾直弘，〈「身分」社会の理解〉，奈良人權部落解放研究所編，《日本歴史の中の被差別民》（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2年），頁87以下。

³⁴ 參閱：A.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24.

³⁵ 參閱：A.G.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149.

面對新附著的「外地」，日本關於血統的論述趨於兩端。一端是基於優生學而主張日本血統應以「純粹血緣關係 (blood purity)」為基礎（即所謂的「純血主義」），出生的血緣被視為血統純粹的唯一明證。而堅持血緣純粹、拒絕異民族混血的理由，是認為「大和民族是三千年來以君臣恩義練成凝結的單一民族」³⁶，是由作為「族父」的天皇血脈相傳所形成的「同祖同族」關係³⁷。那些未參與構建過去歷史的外地異民族，即使再努力給予精神感化，也不可能被同化為大和民族。而既然作為「同一」民族不可能，對於如台灣、朝鮮等殖民地人民，即無須再費心予以義務教育。

另一端則是主張把血統功能化，當成認同國族政治哲學的證據。只要殖民地人民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並盡義務，理論上就可以取得殖民母國的公民身分³⁸。國家可以功能性地將血統的光譜延展到外地的異民族身上，鼓勵他們為國族流血流汗。同時也可以解決在同一國家的憲法下，新附領土人民權利義務的真空狀態³⁹。

作為一個晚熟型殖民帝國的日本，在領土擴張之初，並未如英法等殖民帝國，考慮到資本市場與基督新教文明間的依存關係。因此，並沒有借助「文明化」殖民地來延伸日本帝國統合範圍的計畫，只是將新附領土視為生產原料的供應地。是以，在血統的論述上，採取的是保守的純血主義。而在純血主義之下的教育與權利義務政策，也直接影響到了領台的前三十年，殖民地台灣「文明化」的進程。

對於純血主義最大的挑戰，是以有限地效忠進行涵蓋範圍超過日本內地的帝國戰爭。一九三〇年代後半，在不得不擴張動員範圍至殖民地的皇民化政策開始推行後，保守的血統論述為了配合「內外一體」的需求，也必須更弦易轍，朝向功能性理論靠攏。特別是當血統與最典型的功能——戰爭——相關連後，

³⁶ 參閱：持地六三郎，〈治管見〉，引自駒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48。

³⁷ 參閱：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觀念の形成—国民・臣民・民族〉，《現代と思想》第31號。（1992年9日）。

³⁸ 參閱：D. Heater, *What Is Citizenshi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p.106-7.

³⁹ 參閱：大西祝，〈祖先教は能く世教の基礎たるべきか〉（1897年），轉引自駒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頁59。

其想像的解釋空間，包括共同的政治認識或共同語言等，瞬間為長久以來身陷異質認同困境的殖民地人民，開啟了獲得平等對待的希望。而包括〈志願兵〉在內所有的皇民時期台灣文學，可說幾乎都是環繞著這個希望的共同、或僅僅是個人式的論辯與對話，以及所激發出的驚訝、興奮與歎息。

當然，不可忽略的是，在多年來純血主義的打造下，聯繫血統的可見性（例如透過階級、職業別甚至智力、道德水準來判斷誰有資格成為日本人），與其所引發的各種神秘情緒反應，使得這個殖民地的希望同時也沾染了某種詭異的色彩。畢竟，血統的聯想出現在他者身上時固然是異國情調的（exotic）、有趣的；但是當它出現在自己的國族想像裡，就可能是反進化的、是汙染的，甚至會在「先到者」族群裡引發非理性的反挫。而正是這些曖昧糾結甚至是無解的情緒，包括「中心日本人」與本土菁英的階級緊張（如〈志願兵〉），混血操作（或甚至是單純的想像）所引發的閹割焦慮（如〈道〉、〈奔流〉），以及瞬間由邊陲被提升到中心的違和感（如〈鄉愁〉）等等，豐富了台灣文學裡這個悲壯的一章。

六、「流血」而非「混血」、「換血」

在皇民化時期的台灣同化論述中，除了透過教育制度、公共衛生與文化條件漸次與殖民母國形成「共感的共同體」外，藉由「內台通婚」以及因此所生的「轉籍」效應，解構台灣人的地緣與血緣關係，使其編入帝國臣民的譜系⁴⁰，也被視為突破傳統血統論，實踐「一視同仁」的重要政策。

不過，除了在最後中篇作〈鄉愁〉中對來自九州之日本血統女性的隱諱想像外⁴¹，〈志願兵〉中並沒有出現這種在皇民化時期文學作品中常被使用的混血隱喻。迴避男女情感、身分關係，固然與周金波一向陽剛的寫作風格有關，主要還是因為他所關切者，並不是與日本人在血統上的內台融合，而是作為在台

⁴⁰ 參閱：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同前註 20，頁 252-253。以及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同前註 36，頁 148。關於混血政策的歷史辯論，另請參閱：星名宏修著、莫素微譯，〈「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台灣文學學報》第 6 期（2005 年 2 月），頁 40。

⁴¹ 關於〈鄉愁〉中所出現的罕見日本女性意象之討論，參閱莫素微，〈鄉關何處——周金波的殖民地之旅〉，《台灣文學學報》第 5 期（2004 年 6 月），頁 239-240。

灣生存主體的台灣人，如何能藉由追求現代化，洗乾淨留在台灣人身上的血，晉升為與內地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公民階級。

王昶雄〈奔流〉裡曾在「帝都之土」住了十年的「我」，不斷想把自己「內地化」，因為自覺在「無意識中，內地人的血流進自己的血管，不知不覺之間已靜靜地流著」。而與這種「內地化」最關聯的想像，則是與「東京某良家的一位女性」的感情。只是「我」雖然對她深深戀慕，卻因懷疑自己與內地人結婚的資格，最終錯失了良緣。「我」不禁對於同為本島留學生的伊東，「無任何猶豫而果斷決行」地娶內地人為妻，大感佩服。認為像這樣毅然作出混血的決意，「不愧為真的正大腳色」。而陳火泉〈道〉中的主角青楠，成日陷於繁重的家計、混濁惡臭的陋居與日本同事的冷漠敵視中，身心俱疲，幾乎發瘋。只有在與鄰座「給人純潔高貴的感受」的日本小姐稚月女交談時，才覺得「有如草木復甦般精神抖擻起來」、「有得救的感覺」。青楠因為非日本血統以致未能升官，負氣決意投入志願兵行列。雖然以他的年齡與體格，被錄取的機會恐怕渺茫，但是最後卻在獲得稚月女嬌嗔般的鼓勵，完全忘卻了猶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因為來自內地女人（「大日本之母」）的肯定，創造了虛擬的混血，使他「心中已經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了」。

相對的，由〈志願兵〉到〈鄉愁〉、〈無題〉，在周金波以認同意識為主題的作品中，都不曾出現類似戀慕、或追求日本血統的跡象。對周金波來說，台灣人所追求的內台一視同仁，既是為了政治、社會與經濟地位的平等，也是為了解決已經體會進步滋味的知識階級，在認同一個尚未如日本般現代化的台灣上遭遇的困難。至於藉由混血而皇民化，在血液裡注入真正的日本成分，則並不屬於他的策略光譜。即使只是透過「改籍」、「入籍」內地等「血淚的交換」（〈讀者的來信〉第六信），成為日本人，都不是周金波所贊成的方法。

周金波一九四二年作品〈讀者的來信〉裡的賴金榮，不斷寫信給小說中傾訴的對象（作家「先生」，周金波的替身），討論自己想要透過改姓、前往內地加入日本籍，脫離目前在職場上所遭遇的差別對待，改變那種「孤孤單單，更渺小的存在」，並冀求能獲得「先生」的贊成、背書。但是除了在第七信中嗅聞到「先生」好像有所顧慮的樣子，擔心這不過是「一時衝動的那種熱情」外，

即使賴金榮親自跑上台北，登門拜訪尋求支持，「先生」顯然也沒有給予任何積極的回應。與〈志願兵〉相同，周金波所一貫要呈現的是，台灣之所以必須與日本血統有所聯繫，是為了追求日本血統所隱含的各種價值判斷，包括階級、職業等社會條件，甚至是智力、道德水準與公共衛生。混血與入籍，固然是與日本血統產生聯繫最快的、權宜的手段，不過，透過參與公共生活表達認同日本血統中所傳述的共同價值與文化條件，更能改善全體台灣人的地位。

個人切斷與台灣血緣的「血淚的交換」，在周金波的眼中，是遠不如追求社會條件與文明程度的進化，甚至是能夠讓台灣人說話大聲、「先盡義務，再來提要求」的「流血」⁴²。透過加入志願兵、參與戰爭的「流血」，而非個人的「換血」⁴³，台灣人才可能實踐日本血統中的共同價值，才能爭取地位的提升。

七、國民文化與戰爭的決意

功能化的血統固然是殖民地人民步入母國公共生活之門的鑰匙，但是並未因此合理化給予鑰匙的目的——戰爭本身。包括〈志願兵〉在內的皇民化時期台灣文學最易為後見之明所詬病的方面，就在於被解釋為是盲目或臣服地支持帝國戰爭的合理性。其實，不論從主觀或客觀角度來看，這些作品都未曾、也無能站在日本人的立場合理化這場屬於日本公民的戰爭。

作為一個擁有眾多領土的殖民帝國，對內必須面對帝國內部族群組成複雜的問題，對外又得維護疆界之完整以對抗周邊強權，保護帝國的維生系統。因此，勢必要努力建立一個形成帝國意識的「共同價值與共感 (shared sensitivity)」——也就是帝國的「國民文化」，以提供超越族群、地理疆界的對話空間，凝聚形構國家所需的共同意識。

所謂「國民文化」，是一種抽象的文明經驗。透過這種經驗，維持了特定人群之生活與其社會價值的永續存在。由於人群的存在與繁衍，有其特定的時空

⁴² 周金波，〈私の歩んだ道—文学、演劇、映画〉，同上註 13。

⁴³ 星名宏修則認為周金波的〈志願兵〉是「描述其應否定自身的『血』。為要求成為『皇民』，要『換台灣人的血』，志願當『志願兵』」。參閱：星名宏修，〈「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同前註 36，頁 47。

條件。藉由對這個過程與條件的記述——歷史與共同記憶，族群的經驗與價值得以流傳，生命的共同起源得以被想像、喚醒。而與前述血統的理論相同，由於被賦予打造共同記憶的使命，歷史與共同記憶通常也不會是客觀化的；而是象徵化、被故事與史詩化的⁴⁴，因為如此，才能迅速有效地提示共同的過去與命運，以激發共同的鄉愁，諭示共同的任務⁴⁵。

雖然「國民文化」的內容有相當成分是屬於知識分子的刻意創作，因此其中也必然存在某種程度的選擇與偏好，甚至扭曲。然而這種「公開承認的集體自我崇拜」⁴⁶，卻往往在口耳相傳後自我複製，進而型塑信仰，改變生活態度，甚至變成具有動員性的政治力量。帝國也會積極推動語言與符號的不斷演練、複述，使得國民堅信自己負有實現過去共同光榮或剷除共同恥辱的任務——唯有參與國族任務的實現，個人的內在自由（或壓抑）才能獲得解放，人格才能與國族結合而完成真正的統整。⁴⁷

歷經了因自由民權運動與西歐貿易強權的衝擊所引發的爭論、批判，日本帝國在十九世紀末，終以「敬神、尊王與愛國」三位一體的思想⁴⁸，髹漆「國民文化」的外部建築。在這個「國民的想像」下，日本人生命的共同起源，被定位為「日本人之歷代祖先所奉戴的皇祖皇宗之神靈」、「一氣同體的祖先」。至於國民的生活與社會共同價值，則是架構在自福澤諭吉所倡始的市民自治精神上，以追求西方市民社會的自主與現代化為近程⁴⁹。最終則希望能達到「泰西平民社會正義」之境地，並在「忠臣・良民」的前提下，享有平等的民權。

這個自治的市民社會，是日本帝國維生系統的基礎，它是一個有組織的、中心化的社會合作體系。對內它呼應市民在政治、經濟與教育權利上的需求，對外則凝聚市民利益，以戰爭方式奪取領土與剩餘資源。所以，帝國的所有活

⁴⁴ 參閱：A.D. Smith, 同前註 34, p.25.

⁴⁵ 同上註，pp.26-7.

⁴⁶ 參閱：E.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56.

⁴⁷ 參閱：A.D. Smith, "Chosen People", in *Myth and Memory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40-1.

⁴⁸ 參閱：羽賀祥二，〈明治前期における愛國思想の形成—敬神愛國思想を中心として〉，收錄於飛鳥井雅道編，〈國民文化の形成〉（東京：筑摩書房，1984年），頁116。

⁴⁹ 參閱：小股憲明，〈國民像の形成と教育〉，收錄於飛鳥井雅道編，〈國民文化の形成〉，頁155。

動，包括戰爭，既有對內的政治意義，也有對外的地緣策略。這可以解釋為何其後在一九四〇年代皇民練成所欲建立的「信仰體制」⁵⁰，包含了所謂「戰爭的道義性」（對外）以及「個人內面的確立」（對內）兩大理念。

作為一個晚熟的資本主義帝國，日本在爭奪國際資源的舞台上與歐美諸強權相比，本已居於劣勢。特別是在山東問題以及海軍裁軍會議上，日本明確感受到來自歐美的集體敵視與外交壓力。此時，為了紓解市民參與地緣政治的內在壓力，並清楚表達對資源分配的態度，戰爭已經勢不可免。所以，「維護極東的尊嚴」、「復活國家與國民的生活」、「充實國民的內在生活與條件，以與英美帝國相抗」⁵¹，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準備戰爭時期，日本帝國的國民意識。

然而，長期處於外地異民族地位的台灣人，並不具備上述自市民社會日本之「國民文化」所衍生的戰爭意識。因為做為在市民權利與地緣政治地位上都與母國千差萬別的台灣人，根本無法想像這種不存在的共同過去，當然也就無法與母國同仇敵愾。在嚴格的管制經濟與單向朝殖民母國出口的生產模式之下，作為邊陲生產單位的台灣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形成與母國相同的地緣政治意識。台灣的資產階級鬥爭的對象，不是控制全球或區域市場的英美強權，反而是來自日本內地的資本家⁵²：

「不景氣有賴於地方自治解決」、「自治是全島民的希望」、「不景氣之無法解決，是內地人的不關心。必須由自治，包括政治權利的獲得，作為對策」⁵³。

透過自治，台灣資產階級可以擺脫管制經濟對台灣產品（米與糖）出口日本的總量與價格限制，提升台灣人的經濟地位。然而，這種需求卻是與戰時經濟下，內地對米糖以及台灣廉價勞動力之大量但低價的需求相矛盾的。所以，

⁵⁰ 參閱：寺崎昌男、戰時下教育研究会編，《總力戰體制と教育：皇国民「鍊成」の理念と実践》（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頁347。

⁵¹ 參閱：大島高精，《米國と太平洋》（東京：新政俱樂部，1924年），頁555。

⁵² 關於台灣資產階級與內地資本家間的鬥爭，參閱如：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出版，2003年），頁197以下。

⁵³ 參閱：唐澤信夫，《臺灣島民に訴ふ》（台北：新高新報社，1935年），頁68-69、76、79。

台灣的資產階級利益與日本內地準備發動戰爭的資本家是嚴重對立的。當台灣人在公民權利上的需求與內地公民相衝突的時候，又如何有能力或立場站在日本人的角度，合理化完全屬於日本公民的戰爭？

至於一向對抽象政治冷漠的勞動階級，則因為殖民母國蠻橫的市場控制（包括壓低農民的生活水準、強制轉作導致工作機會喪失等），利益飽受剝削，更是無可能在「個人內面」認同「戰爭的道義性」。

八、殖民地效死帝國的精算

雖然台灣人與內地在戰爭利益上是相衝突的，但是戰爭已經勢不可免，而從屬的台灣，又必須被捲入戰爭，這時，台灣人必須要有自己的對策、打算。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何「我」為何要明白點出張明貴是個「打算得太精細了」、「用在東京所得到的知識階層的算盤來計算」命運之人⁵⁴。因為張明貴對於成為公民的認識，顯然僅止於「作為一個日本人」的個人權利需求，而欠缺作為因戰爭而形成的命運共同體——殖民地台灣——的領導階級應有的反思：

為什麼不做日本人不行的原因，這是我首先必須考慮的，我在日本的領土出生，我受日本的教育長大，我日本話以外不會說，我假使不使用日本的假名文字我就無法寫信，所以我必須成為日本人以外沒有辦法。

然而，已經近在咫尺的公民戰爭，與台灣因為被差別而作為一個與日本相對立的共同體這個事實，卻是張明貴這種個人思考所「無法決定的因素」。但也就是可能解決同樣屬於自日本返台的「我」多年來遭遇的異質認同困頓的關鍵因素：

我的期待雖有些模糊，但我對他所期望的竟是在八年前，當我告別東京生活時，到現在我還是無法忘卻的同樣的感傷。

⁵⁴ 對於小說中以及其後作者的評論為何將張明貴描述為一個「精打細算」的典型的疑問，參閱如：方孝謙，〈日據後期本島人的兩極認同〉，收錄於氏著，《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探索》（台北：巨流，2001年），頁159。和泉司則是將張明貴解釋為「近代主義者」的典型，所代表的是受有教養與訓練之同世代留學知識人共有的感覺。參閱：和泉司，〈青年が「志願」に至るまで—周金波「志願兵」論〉，《三田國文》第41號，2005年6月，頁16。

對於這些決定性的外在大因素，自然不能再用「在東京所得到的知識階層的算盤來計算」了，而必須是從「為台灣而推動台灣」的立場出發才行。勞動階級的高進六發現透過皇民練成與志願兵制度，促進了島內同階級前所未有的團體性律動⁵⁵：

只有祈禱，只有實行，不實行是無所獲的，這是我們的信條，我們隊員間的團結因此更加緊密。

「在帝國的戰爭欠缺合理性之時，看似膚淺、盲目的愛國主義，其實正是勞動階級利用戰爭追尋『本國』政治力量的團體偽裝手段」⁵⁶。現在，勞動階級已經為提升自己的政經地位邁開步伐了。而領導菁英們呢？至少在〈志願兵〉的結尾，張明貴已經領悟到，過去堅持日本立場的合理性是「腦筋太硬板了」，也獲得了「我」的衷心讚許。領導階級們必須「從現在起要多努力」，帶領台灣藉機走向現代化、公民化，並進而解決自己的認同困境。

相對於〈志願兵〉中各個階級間為自身利益所展開的論辯與反思，陳火泉〈道〉中作為一個技術勞動階級意識的「我」，在完全沒有機會與命運共同體內的其他階級對話的情形下，即自願跳進屬於公民階級的戰爭，決意如日本人般步向皇民之道就死，就未免顯得過於突兀了。

九、環境決定論與階級衝突的潛伏

在高進六與張明貴關於如何成為日本人的論辯中，首度具體出現了其後持續潛伏在周金波小說（〈鄉愁〉、〈無題〉）裡的隱憂，那就是在追求公民身分過程中，領導階級感受到的階級流動的壓力。

⁵⁵ 依據宮崎聖子的研究，高進六所參加的青年團，是為了無法繼續升學的青年所設計之教育機構，以培育街庄層級的領導階級為目的。所以，透過青年團，這些勞動階級首次能夠固定地進行集團化的集結。參閱：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灣における青年團——一九三五～四〇年の漢族系住民の青年團を中心に〉，「日本台灣学会第6回學術大會」，2004年。

⁵⁶ 參閱：M. Mann, "War and Social Theory", in *State, War and Capitalism*, p.159。

對於僅受小學高等科教育、屬於勞動階級的高進六所堅持，藉由在島內參加皇民鍛鍊團體的道場（報國青年隊），透過「拍掌儀式接觸到大和精神，努力去體驗大和精神」等形式主義的體驗，就可以成為日本人的說法，留日的知識階級張明貴自始至終都表示反對。他不但認為這是知識分子「腦子無法接受」的作法，而且根本是「像被矇住眼睛一樣盲目亂撞」。他甚至將這些信奉形式主義的勞動階級貶抑為「像被矇住眼睛的拖馬車的馬」。

對於自己留日期間在台灣「代理人」、和自己「一直很親近的往來」「最知己的朋友」，只不過是同樣追求成為日本人，為何會做出如此嚴厲的批評，甚至最後乾脆避之猶恐不及？究其原因，是領導階級鞏固自身優勢的「環境決定論」，受到了新的挑戰。

自小說的最開端，作者就已經點明了張明貴是個環境決定論者，是「抱著皇民鍛鍊必須從環境來形成的想法」之人。對於張明貴以及「我」等留學東京的精英分子來說，儘管長年的東京生活「留下了哀愁的感覺」，卻同時也建立了「生活的價值」。因為在日本的教育、「在皇居二重橋前能感受到嚴肅的叩頭那種感激」「到靖國神社參拜叩頭」等等環境條件，給自己注入了日本精神，所以張明貴以及「我」可以成為日本人：「我可以斷言我就是日本人，成為日本人有那麼困難嗎？我一點也不覺得」。

環境決定論，是日本在進步史觀下對於台灣採取漸進同化政策的思維基礎⁵⁷，與血統論可說是一體兩面：

自然風土之影響最明顯可見的部分，就是人的體質與氣質。而這個要素又是與民族的形成有密切關係。風土影響了生產力，進而影響了民族的發達程度，這是進步史觀的思維方法⁵⁸。

國民生長的环境，是與勝利基因之構成以及血緣相傳絕對關聯的符號。從外觀來看，生長環境是一種客觀、容易識別的疆界，足供不同血統間互相區隔，

⁵⁷ 參閱本文前述田健治郎施政方針。

⁵⁸ 高島善哉，《民族と階級：現代ナショナルリズム批判の展開》（東京：現代評論社，1970年），頁361。

特別是在像日本這類擁有天然邊界的國家。同時，土地、氣候等自然條件，本身具有高度的集合性象徵，可以印證勝利基因之所由生⁵⁹。土地環境既是共同祖先神話與史詩誕生之所在，開發、耕耘與定居在該土地上的族群，自然也就擔負了繼續創造血統所承載之記憶與象徵的任務。因此，在傳統日本的國族認知上，唯有在該環境下出生、或受傳承民族生活理想之歷史教育之人⁶⁰，才有資格承擔這種任務與分享血統利益。而這種能到日本傳承歷史教育者，又以對子弟教育熱心的台灣資產家的後代為主⁶¹。從台灣人赴日留學生數為基礎看來⁶²，有資格成為日本人的人數並不多。

也因為環境條件與階級的既得利益之間，存在有這種必然的關連，所以張明貴堅持必須是受過「以前缺少的教養和訓練」、「把台灣的水準拉到和日本內地一樣」的人，才能成為日本人。即使是進入穩定在地階段的「我」，也認為「必須要從文化向上，生活向上開始，要這樣就必須要有更自由的心胸去更廣範圍的吸收各方面的知識」的人，才夠資格晉身公民階級。

在王昶雄的〈奔流〉裡，辛苦留學內地，以致體格與語言能力都與日本人無異的台灣人教師伊東，也曾作過相同的宣示：

一般人常說的日本精神，要是不透過古典來看的話，就沒有意義。……
離開了日本的古典，就沒有日本精神了。

然而，這種透過內地文化環境加冕所取得的階級穩定性，卻被志願兵制度這個突如其來的改變給打破了。原本對自己只能流露出「一種懷念或說是一種羨慕」、對他小心翼翼的恭維也只需加以冷淡、斷續回答的勞動階級，現在不但可以用流利的日語與自己平坐、激辯如何成為日本人，還以各種自己原本瞧不起（或做不到？）的具體行動如改日本姓名，以及皇民鍛鍊方法，步步進逼自己的領導地位。面對這樣始料未及的新局面，張明貴等領導階級如何能不採取

⁵⁹ A.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p.28-9。

⁶⁰ 參閱：西村真次，《日本民族理想》（東京：東京堂，1939年），頁197-198。

⁶¹ 參閱：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即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年），頁43。

⁶² 同上註。

「挺身直坐、把浴衣的裾端收起來，用手把腳緊緊地抱住的姿勢」，「眼裡露出了異樣的閃光」，以準備迎戰這個企圖取代自己領導地位的人？

這種因為加速皇民練成與志願兵制度所導致島內的階級緊張，可以由曾長住台灣的日本警察官鷺巢敦哉的敘述中，得其端倪：

思想運動喧囂的時代，雖然人數不多，但所謂知識階級站在前頭，很多大眾也會心裡暗暗共鳴。這是難辦的問題。我擔憂在這階級不共鳴不支持之中，皇民化運動會變得甚為輕薄。⁶³

島內知識階級對於速成型的皇民化，基於自身的階級利益，普遍採取的是「不共鳴不支持」的猶疑態度。其實，不僅是在島內，即使是統治者陣營，對於高進六這種深信靠著「經過拍掌的形式產生一種信念」就能成為堂堂正正日本人的形式主義，也有反對之聲：

涵養皇民精神的完成，有待於普通教育徹底普及後。最近我看到在島民有過度趨於皇民化運動的外型改變，卻不伴隨著精神涵養。在此再次建議，普通教育的普及與義務教育的實施，才是皇民化運動的最大急務⁶⁴。

顯然，這種速成的官方民族主義，同樣在內地創造出了階級的緊張關係。帝國中心的資源分配，將可能因來自台灣大批「邊緣日本人」的加入，而必須重新調整。而「中心日本人」對於這種變化的潛在抵抗，也會是決定台灣人公民法之路是否平坦的魔咒⁶⁵。

「我從現在起要多努力，請姊夫也多給我鼓勵吧。」

明貴的聲音像是一種關不住的熱氣所衝出來的高聲，卻又嘗試著把它壓下去的語調。然後咚咚咚快速地往三樓的梯子走上去。

⁶³ 參閱：鷺巢敦哉，〈台灣皇民化諸問題〉，《台灣時報》240期（1939年12月），頁19。漢文翻譯則另參考：石川香代子，〈周金波〈志願兵〉析論〉，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12月，頁21。

⁶⁴ 參閱：白井朝吉、江間常吉，〈皇民化運動〉，頁23。

⁶⁵ 關於帝國民族意識型態的魔咒說法，另請參閱：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p.110。

勞動階級藉由國家的力量勇猛奪取了翻身的機會，就像是「一種關不住的熱氣」，「精打細算」的領導菁英們雖「嘗試著把它壓下去」，然而這種「努力」是否可得，對此，同一戰線上的「我」和張明貴，都只能「結結巴巴」，沒有答案。這個隨著公民化與國家化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階級衝突隱憂，也將一直糾葛著周金波到終戰的劇變為止。

十、結語

部分論者認為〈志願兵〉所欲傳達的，對殖民母國日本的終極認同，是陷入殖民者刻意創造的殖民思維或殖民心態。既然〈志願兵〉的「日本認同」是殖民權力（皇民化）所賦予的，即使其中有掙扎、論辯，由於無法脫離皇民化自身的邏輯，所以仍屬於殖民政策的產物⁶⁶，依此證明將之歸類為皇民文學的正當性。然而這種解釋顯然將文學過度化約為「國家設施（state establishment）」本身，忽略了文學作品仍可能作為提供內在辯論功能的公共領域。其實，單單由戰時受高度警察管制的文藝評論圈對包括〈志願兵〉與陳火泉的〈道〉等作品豐富的正反論辯（如濱田隼雄、西川滿、辻義男、韓哲、窪川鶴次郎等），以及不論是戰後被定位為反抗作家或皇民作家者，在戰時都仍然努力創作、盡情發表等事實，就可以理解，文學作品所提供的思維場域，絕非國家意志所能全然操控。

其次，即使在風行草偃的認同政策之下，仍有可能存在「去殖民」的思辯。除非所謂的「去殖民化過程」被狹義化為只限於由殖民者所主動採取，或是被殖民者所展開之具體的反抗行動（如暴力革命、不合作，或是在文化上租借某民族主義，重申主權），也就是如 E. Said 所描述的，「以巨大充沛的努力與宗主國進行平等辯論」⁶⁷。事實也證明，後者在軍事動員時期以至日本戰敗的台灣，根本就不存在⁶⁸。

⁶⁶ 參閱：L. T. S. Ching, 同前註 11, pp.124-5, (荊子馨), 頁 171-172。

⁶⁷ 參閱：E.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Y.: Vintage, 1994), pp.226-7。

⁶⁸ 單就文學活動而論，例如被陳芳明贊稱為「具有清楚的歷史觀，表現在皇民化運動與太平洋戰爭臻於高潮的階段，誠然附有抗拒的政治意義」（參閱：陳芳明，〈黃得時的台灣

如果殖民意識可以被定義為一種從屬的、被迫接受的、充滿差異與歧視的異質認同⁶⁹，那麼除了拒絕描述以外⁷⁰，以積極描述的方法消滅這種異質化的新辯證，包括透過「反殖民化」或「逆殖民化（reverse colonialization）」，使從屬人民藉由共同語言，取得新的、或是相同的利益基礎，也應該可以被視為一種去殖民的過程。在這種描述中，作者並非僅受制約地呈現宗主國（帝國）的文化地形，使帝國的空間與殖民地連結，反而是利用帝國的機器，賦予某種利他的任務，包括藉此揚棄帝國所欲造就的，永遠可供予取予求的次等地位。

周金波利用〈志願兵〉，提供了這樣一個以論辯消滅異質認同的公共領域。「我」、張明貴與高進六，這些不同階級的台灣人，使用過去不曾存在於台灣島上的共同語言——流利的日語，藉著這個公共領域，進行了試圖消除異質化認同的論辯。客觀的「我」，除了作為一個冷靜自省的凝視結構，也是容納一切可能目標、算計的平台⁷¹。「我」既可能冷眼但體會地描繪在內地接受教育，「好像被（帝國文明給）纏住了」，回台灣後連交通都適應不良的「領導階級」的窘境與寂寞感，也能容納僅小學畢業的土著勞動階級，靠著儀式與群體力量創造認同信仰的直接手段。當然，「我」同時也必須反映出作者潛藏在內心中的矛盾：

文學史書寫及其意義〉，收錄於氏著，《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2004年），頁174）的黃得時之《台灣文學史序說》（發表於1943年7月31日《臺灣文學》3卷3號），其實並未具體超脫同化史觀。黃得時僅於文中表示，台灣文學擁有清朝文學以至明治文學所未有的獨特性格，然而此一性格也只能說明台灣文學在殖民統治下的特殊發展歷程，在性格上與日本文學不同，卻還未如陳芳明所擬想的，鮮明地「對抗殖民霸權論述」——包括透過新敘事來追求一個新的台灣民族文學起源。另外，由楊雲萍在《文藝台灣》6卷5號中對黃得時該文之「學術」批評，亦可理解該文「去殖民化」的效能如何。或許張文環的「歉然」，可以更正確地說明當時文壇的客觀情況：「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假若有寫非皇民文學的人會被槍殺」。

⁶⁹ 關於殖民主義的定義，因針對者為地緣關係、經濟、政治以致文化等論題，不一而足。參閱：D. K.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London: 1983) pp.6-7。漢文資料則參閱：高岱、鄭家馨，《殖民主義史：總論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47。此處所採的是文化與認同上的意義。

⁷⁰ 此處意指荊子馨所創造的新分類，即所謂存在皇民文學與反抗文學之間的一種「非皇民文學」（參閱：L. T. S. Ching, 同前註11, pp.121-3, 荊子馨，頁167以下。文指林瑞明之觀點）。依其見解，這種既不歸降亦非抵抗的文學（其舉例如王昶雄的〈奔流〉），本身已適足呈現了反殖民的道德基準。

⁷¹ 藤井省三則將「我」解釋為跨越個體差異，與大日本帝國相對峙的殖民地人的「我」。參閱：藤井省三，〈「大東亞戰爭」期における台湾皇民文學—讀書市場の成熟と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形成〉，《台湾文学この百年》，頁63。

是一種屬於中智階級的，夾在無能撼動老殼的不感症與面對新興階級挑戰的恐懼間的矛盾⁷²。而這個矛盾也將持續纏繞、再三隱現在周金波後續的作品如〈鄉愁〉、〈無題〉中。

所以，志願兵制度這個論壇，並不是終極的目標或信念，而是被周金波策略性地用來反映殖民體制下人性共同的真實，因為它仍然允許對帝國作為與價值的懷疑，與個人利益的算計。由周金波參與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七日文藝台灣〈關於徵兵制〉座談會中，相對於長崎浩、神川清甚至是陳火泉等被賦予政戰任務作家之積極表白，顯得刻意避重就輕、答非所問的態度，可以理解他所真正在乎的，是在座談會中所極力自我侷限的，「台灣的感激（反應）」、藉由制度「描述存在於民族間精神的燃燒，從這裡找到解決之道」、反映出「同世代中的二個不同想法……代表這時代的兩種台灣本島青年」，甚至是本島人的語言能力的重要等等供台灣人自省的課題⁷³。至於兵役制度對日本帝國的貢獻等國粹式的議題，根本就不是周金波的文學所關切的。他所關切的，只有「為台灣而推動台灣」的部分。

〈志願兵〉中的「我」，對於高進六一廂情願的形式主義、甚至血書志願，以及張明貴的知識階層狡猾的算盤，都沒有絕對的評價。「我」對張明貴向高進六的認輸，並無情感反應，也不知張明貴所謂的努力，具體成效會如何，只有模糊的期待而已。周金波或許存有像高進六這種「不需要任何理由而表示自己就是日本人」的人，於當時的客觀情境下，「才是正確的生存之道」⁷⁴的感慨。不過，「我」和作者對於高進六的選擇，並沒有如多數評論者所詮釋般的「肯定」⁷⁵，而是充滿了對階級衝突的、流血的、可能無效率的，以及反思自身無力的隱憂。更沒有因此將「皇民化」視為台灣的「近代化」的同義詞⁷⁶。

⁷² 相對的，垂水千惠則認為與王昶雄、呂赫若相較，周金波的〈志願兵〉是「毫不保留的使命感的告白」，對「皇民化—日本化—近代化」採取直線肯定的態度。參閱：垂水千惠，〈「清秋」その遅延の構造〉，收錄於下村作次郎等編，《よみがえる台湾文学：日本統治期の作家と作品》（東京：東方書店，1995年），頁384。

⁷³ 〈徵兵制をめぐって〉，收錄於中島利郎、黃英哲編，《周金波日本語作品集》（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頁279。

⁷⁴ 同上註，頁282-283。

⁷⁵ 這幾乎是絕大多數研究者對於〈志願兵〉文本結尾的解釋。例如：垂水千惠，〈戰前「日本

正因如此，在〈志願兵〉中，才會有「我」知道這條通往建構台灣人認同的路途，其實還不明朗（「光線被遮住得有點暗」），而且恐怕會十分漫長（「這樣慢慢地登上樓梯，倒覺得這樓還相當長」），可是在戰爭時空的主客觀條件下，台灣人是別無選擇的，所以也「只好靠著露出來的一點光線，像數樓梯一樣，一步一步登上去」，這般淡漠、沉重的結尾⁷⁷。並非如陳火泉在〈道〉的盡頭那種「步向皇民之道就是死」，直接了當、堅信不疑的吶喊。於今，搭乘著戰後反帝、反殖民的後見之明，以志願兵制度並沒有如周金波所預期的，帶給台灣人在公民身分或至少是物質條件上的平等，論斷作者的思維是「缺乏思考、幸福的奴隸」⁷⁸，對台灣文學研究者來說，未免是撿選一條太容易的道路了。

由周金波小說所選擇的題材、人物與布局，以及其中論辯的形式與關懷的議題，我們可以確知他真的是一位以台灣人為本位，「愛鄉土、愛台灣」⁷⁹的作家。只是，他的「愛鄉土、愛台灣」，並不是「抒情歌詠」台灣山川土地或風土人情，這個內心充滿焦急的心的醫生，常以坦然、激越、銳利但瘦骨嶙峋的書寫，描繪內心的台灣，「以長遠的眼光」呈現「大膽而且是抱有跳進現實裡面的精神的事情」⁸⁰，藉以表達自己對台灣強烈但複雜的感情。他自承「笨拙的長篇大論是我的方法，厚顏是我的勇氣」⁸¹。即使〈志願兵〉是一份「火速構成

語」作家——王昶雄與陳火泉、周金波之比較》，同前註 4，星名宏修，〈再論周金波——以「氣候與信仰與老病」為主〉，「賴和及同時代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1994 年 11 月。方孝謙，〈日據後期本島人的兩極認同〉，收錄於氏著，《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探索》（台北：巨流，2001 年），頁 159，以及吳叡人，〈他人之顏：民族國家對峙結構中的「皇民文學」與「原鄉文藝」〉，「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2005 年 10 月 15 日。

⁷⁶ 參閱：塚田亮太，〈閱讀《周金波日語作品集》：一位台灣「皇民作家」的精神軌跡〉，《台灣文學學報》第 3 期。（2002 年 12 月），頁 8、11。

⁷⁷ 中島利郎則是將之解釋為「象徵台灣庶民與那些留學知識人之間懸隔的表示」，參閱：中島利郎，〈周金波新論〉，收錄於啞啞之會編，《台灣文學の諸相》（東京：綠蔭書房，1998 年），頁 116。漢譯版參閱：中島利郎，〈周金波新論〉，收錄於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 年），頁 12 以下。

⁷⁸ 如：藤重典子，〈周金波的贈禮〉《中國文藝研究會會報》第 108 號（1996 年 10 月）（漢譯版參閱：邱振瑞譯，《文學台灣》第 23 期（1997 年 7 月 5 日），頁 247-248）。

⁷⁹ 中島利郎，〈周金波新論〉，頁 106。

⁸⁰ 周金波，〈台灣文學のこと〉，收錄於中島利郎、黃英哲編，《周金波日本語作品集》，同上註 74，頁 193。

⁸¹ 周金波，〈受獎の感想（文芸台灣賞第一回受賞者）〉，收錄於中島利郎、黃英哲編，《周金波日本語作品集》，同上註 74，頁 204。

的素材」⁸²，結構卻是較處女作〈水癌〉精妙許多。周金波在〈志願兵〉中所選擇的始初路徑，其實不難與作家在戰後消極但堅持重新構建的台灣認同，聯繫起來。

⁸² 參閱：辻義男，同上註1。「周金波的代表作〈志願兵〉，是1941年6月，為響應台灣人志願兵制度的成立，而立刻撰寫成的小說」（參閱：藤井省三，〈ある日本語作家の死—周金波追悼〉，《台湾文学この百年》，頁160。漢譯本參閱：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麥田出版，2004年），頁184）。

